

革命文学新编

马立新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革命文学新编

马立新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文学新论/马立新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472-0006-3

I. 革... II. 马... III. 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1685 号

- 书 名** 革命文学新论
著 者 马立新
责任编辑 樊庆辉
封面设计 孙俪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济南宏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印 张 11.87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0006-3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一) 革命战争文学的历史踪迹	1
(二) 二十世纪革命战争文学批评管窥	17
第一章 红色理性导论	27
(一) 人类理性精神的历史变奏	28
(二) 红色理性的内涵与外延	35
(三) 红色理性的特殊规定性	40
第二章 红色理性与主体思维	44
(一) 理性与主体思维	46
(二) 红色理性的思维范式解析	49
(三) 红色理性制导主体思维	58
第三章 红色理性与文本创作	74
(一) 红色理性与主题意蕴	75
(二) 红色理性与人物性格塑造	103
(三) 红色理性与史诗性的宏大叙事	115

第四章 红色理性与革命传奇	127
(一) 红色理性提供传奇精神资源	128
(二) 传奇性寓于理性之中	130
第五章 红色理性与精神快餐	139
(一) 红色理性诱导特定审美心理	140
(二) “精神快餐”的话语品格	148
第六章 红色理性与《桥隆飙》	164
第七章 红色理性的世纪悲歌	192
写在后面	212

绪 论

（一）革命战争文学的历史踪迹

马克思说：“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阶级以来，阶级斗争就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文学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进行审美关照的意识形态就不能不把战争这一重要的特殊的社会实践纳入自己的视野中心，由此诞生了战争文学。“若抽去战争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殿堂的根基就会立即发生动摇。战争文学在一部三十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十分显要的位置。”^② 虽然战争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有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战争；战争的根源也是多元的，有领土之争，有经济利益之争，有宗教信仰之争，但从根本性质上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② 曹文轩：《论战争文学的缺憾》，解放军艺术，1985年第4期，第86页。

2 革命文学新论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①。据此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战争就同以往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战争划清了界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目标，以解放千百万劳苦大众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终极目的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引起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战争，它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也不同于历次农民起义战争。这就决定了与此相应的革命战争文学在文学观念、表现形态、历史内涵、价值取向和审美诉求等诸多文学要素不能不发生重大的嬗变，从而呈现出某些独有的或迥异的生态风貌。但历史是无法割断的，革命战争文学发生在五四新文学的土壤中，却与以往的战争文学有着天然的继承关系。所以考察和梳理革命战争文学的成长脉络，首先有必要对以往的战争文学风貌作一个鸟瞰。

战争文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②《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战争题材诗歌可作为我国战争文学的最早源头。《诗经》中那些歌颂战争的诗篇大多是对正义战争的赞颂；而其中那些对战争表示怨恨和不满的诗歌，多是针对不义战争或针对战争破坏了社会生产这一面的，这是我国最早的战争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大明》^③、《伯兮》^④、《君子于役》^⑤、《采薇》^⑥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楚辞》^⑦中的

①（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第30页。

② 陈辽等：《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绪论》，北京：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③ 陈晓清 陈淑玲译：《诗经》，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229页。

④ 陈晓清 陈淑玲译：《诗经》，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3页。

⑤ 陈晓清 陈淑玲译：《诗经》，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8页。

《国殇》大概是我国第一首具体描写战争场景的诗歌，它写的是一场全军覆没的车战。在一幅幅描写战争场景的画面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屈的战斗英雄的集体。《左传》^③开始写出了战争的复杂性，写出了战争中人物的性格，写出了某一战争的全过程。《史记》^④对我国古典战争文学更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史记》出现以前，我国战争文学缺乏对某一时期战争的整体性的描写，广度不够；对造成战争的根源和胜负的因素开掘的深度不够。到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汉之间的战争，汉王朝的内外战争，都带有全国规模的性质，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只写某一战役，某一战斗及其进程，已不足以全面地、深刻地反映那时的战争。有着丰富生活经历和高度艺术素养的司马迁，在描写战争前曾亲自访问过能征惯战的父老和将领，曾认真考察过前代战争的地形、地物，曾仔细研究过前代记叙战争的历史和典籍，这就使他有可能会突破以往战争文学的写作水平，而把战争描写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班固等人撰著的《汉书》也有不少有关战争的艺术描写。从整体上看《汉书》^⑤中的战争文学，虽然缺乏《史记》那样的大气磅礴、天马行空的艺术魅力，但在具体地、艺术地描写二百三十年间的战争史方面，在重大事件中刻画不同性格的人物方面，在真实地再现战争的场景区方面，在显示战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方面，仍然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就。由《史记》、《汉书》开创的在历史著作中描写战争的文学传统，在其后的二十二史中有所继承和发扬。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题材诗歌，比之过去的战争题材诗歌又有突破，出现了以记叙和歌颂某一君王、某一朝代战争勋业为主要内容的战争诗歌的新品种。唐诗达到了我国

① 陈晓清 陈淑玲译：《诗经》，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② 崔富章等注释：《楚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③ 张燕瑾：《文白对照全译左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

④ 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

⑤ 吴恂：《汉书注商》，上海古籍出版，1983年版。

4 革命文学新论

诗歌艺术的高峰，唐代战争诗歌也达到了我国战争诗歌艺术的高峰。唐代战争诗歌中写得最多的，是军人的生活 and 感受。在边塞诗中，军人的种种生活，种种感情，几乎都被诗人们写出来了。在另一些唐代战争诗歌中，则成功地刻划和塑造了当时的英雄形象。他们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精神抖擞地站立在读者面前。构思的独创性，讲究战争题材诗歌的意境，精心描写战争的画面，是唐代战争诗歌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

以唐人传奇中的战争题材作品《聂隐娘》为开端，我国出现了战争题材的古典小说。其后，到元末明初，以《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为标志，第一次诞生了全景式描写战争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还不只是从时间的长度上，战争的广度上，来显示其“全景战争文学”性质，而且从反映战争的厚度上，表现了它是真正的“全景战争文学”作品。它写了几个高级统帅部，写了若干个最高战争统帅，写了十几个前线指挥员，写了数十名大将和战将，写了难以计数的偏将和末将，以至小校、士卒、老兵，通过他们的斗智、斗勇，写出了我国封建时代战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描写战争的这一厚度，使《三国演义》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三国演义》是“全景战争文学”作品，还表现在它绝不是孤立地描写战争，而是密切地联系着政治斗争，描写了三国时代的整体社会生活。举凡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风土文物、民情风俗、轶事秘闻，它都结合战争描写把它们一一写了出来。因此，《三国演义》给予读者的又不仅是三国时代的战争画卷，而且是三国时代的社会生活画卷，这才使它的“全景战争文学”性质具有了更加完满的意义。《三国演义》创造“全景战争文学”的这一经验，对我国后来的战争文学创作影响至大。无论是《杨家将》、《说岳全传》，还是《罗通扫北》、《王虎平西》，几乎都向《三国演义》学习，不只写某次战斗某几个将领，而是都写了最高统治者，战争统帅和各员大将、战将，都写了战争全局，具有一定的“全景战争文学”性质。鸦片战争后，我

国近代文学中的战争文学作品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之子洪兴全创作的反映中日甲午战争的《中东大战演义》，黄世仲的表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洪秀全演义》，都在国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从上可见，我国战争文学创作的历史久远，传统深厚，影响广泛，其中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人类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战争文学经典作品，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值得我们永远开掘。但是，上述战争文学都属于古典战争文学范畴。一则它们所反映的战争，要么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和中国内部民族之间的战争，要么是当时的反侵略战争和农民战争，虽然后者和前者的性质、意义不一样，但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本质上都属于旧式的战争范畴；二则它们据以反映战争的世界观大多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的或机械唯物论的；三则它们表现的军队，不管是王朝的军队还是农民的武装(虽然两者的性质不一样)，也都是属于旧式的军队。所以，古典战争文学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封建思想是大量的。

二十世纪 20—40 年代，中国发生了以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较之以往的所有战争有了不同的特点。毛泽东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概括为四个，“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也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战争：“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

6 革命文学新论

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新性质和新特点不能不赋予新生的革命战争文学某些不同于以往的战争文学的新特征。革命战争文学是因循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历程一步一步地发生发展起来的。真正的革命战争文学的萌芽可追溯到中国工农红军初创时期。在这时期中，革命战争文学的主要成果是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诗歌和战地通讯。但最能代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文学创作实绩水平的是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瞿秋白等创作的以红军反围剿斗争为题材的诗词，其中以毛泽东的创作水平为最高。当着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井冈山地区创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敌我力量的对比是悬殊的。但他深信革命事业必定胜利，因此面对任何严重的敌情都能保持那种大智大勇的无畏精神，“山下旌旗在望，山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192页。

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①这就是红军指战员在当时严重敌情下的无畏形象。因为红军“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有所准备有所依恃，所以他们才无所畏惧。在长征途中，娄山关战斗是一次关键性的激烈战斗。敌人据守着险峻的关隘，以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在红军指战员看来，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②。而当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节节退让的时候，红军却发出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誓言，表示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③的必胜信心。红军指战员既然保持着这种大智大勇精神，他们对革命事业也就必然保有革命的乐观主义。表现工农红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构成了毛泽东全部军事题材诗词的基调。“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④，固然突出发现了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即使像《娄山关》那样一首浸染着悲壮美的词，也表现了红军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雄关漫道真加快，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了夺取胜利，红军要越过一座座雄关，绝不因受到暂时的挫折而动摇革命必胜的信心。“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更是红军指战员革命乐观主义的高度发扬。着力表现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毛泽东革命战争题材的诗词又一个重要的主题。1930年1月，红军向闽西进军。行军途中遇到的困难不少：“路隘林深苔滑”，但是红军克服了行军途中的困难：“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⑤充满了一种压倒一切困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在《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也不曾被困难吓倒。在红军眼中，连绵不绝的险峻的山岭，不过如翻腾着的细浪，气势磅礴

① 《井冈山》，《毛泽东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② 《娄山关》，《毛泽东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③ 《六盘山》，《毛泽东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④ 《长征》，《毛泽东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⑤ 《元旦》，《毛泽东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8 革命文学新论

的乌蒙山脉也只是滚动着的泥丸。在急湍的金沙江边，红军指战员并没有把它视为畏途，而是在那里欣赏起金沙江水和峭壁相击的奇景，坚信金沙江阻挡不住红军前进的脚步；在大渡桥头，红军也不曾在发山冷冷寒光的铁索前畏缩。红军对待困难的态度，以及在困难面前的表现，被毛泽东极其生动、具体、形象地描绘了出来。毛泽东对红军英雄形象特别注意刻画其崇高、壮美的精神境界。“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不仅写出了红军的沉着、坚定，也写出了红军胸有成竹，妙计早定，只等敌军入瓮的内心的喜悦。《会昌》^①不仅写出了红军对进军的胜利前途充满信心，而且还表现出红军对祖国锦绣河山的热爱：“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十六字令三首》^②更写出了红军的精神本质：“山！快马加鞭未下鞍。猛回头，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锊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这里，表面上看的是山之高、山之势、山之峻，但实际上却是揭示了红军的精神气质，他们象山一样高大，有着山一样的气势。总之，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写下的诗词是我国现代革命战争文学的重要收获。

抗日战争时期，战争文学“五年间的发展，抵得上抗战前的二十五年”。^③抗日战争的爆发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极大地凝聚起国人的爱国热情。在同仇敌忾奋起御侮的抗日洪流的感召下，本来就具有愤世感伤忧国忧民传统的中国文艺界立即暂时搁置了五四以来各持己见的文学观念论争，以“抗协”为统一的文艺组织，

① 《会昌》，《毛泽东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② 《十六字令三首》，《毛泽东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③ 郭沫若：《沫若文集 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9页。

把文艺作为他们抗战的“武器”，谱写了大量的应时的抗战文学作品。

“自抗战以来，凡是优秀的作家，都一致的表示了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贞，始终服从着国家民族的号召，为抗战尽着自己最善的努力。作家意识和感情间，平时所存在着的沟渠，或门户之见化除了。整个的文艺界形成了一个总的大团结。各个文艺部门也个别的形成了分的总团结。大家的笔杆和工具，都集中于共同的目标，把不必要的内部斗争减除了。这可节省了无限的精力，同时也就丰裕了创造力的源泉。文艺工作者由于互相接近，增进了互相认识，相互观摩，互相鼓舞，因而养成了一个比较公平无私的互相批判。文艺作品的美，不纯为派别意识所左右了，大家都希望能和衷共济，通力合作，由一向的‘文人相轻’转化而为‘文人相爱’。这是抗战前所难期待的现象。”^①抗战初期的战争文学主要成就在诗歌和报告文学方面，“虽然在质的方面我们还不好说有若何伟大的成就。”^②丘东平的《第七连》记录了一个在战斗中受伤的连长的谈话，这位连长回忆了在上海附近与日本侵略军战斗的实况。丘东平是一个真正的文艺战士，他在反扫荡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在敌后根据地报告文学创作中，周立波是比较出色的一位作家。他在晋察冀边区期间写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他根据在晋北和晋西的见闻，写了《战地日记》。这两本报告文学集记载了八路军和广大人民英勇作战和顽强机智，充满了血肉和烽火硝烟交织的战斗气氛。尤其是《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以流畅明快的笔调叙述了在华北平原上进行的残酷的战争，从各个方面反映了边区创立的过程，表现了人民群众从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战斗，开创革命事业的精神。何其芳根据自己的见闻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七一五团和大青山》，叙述了大青山

① 郭沫若：《沫若文集 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4页。

② 郭沫若：《沫若文集 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5页。

游击根据地的发端以及领导创立根据地的八路军七一五团的艰苦历程，写下了自己对贺龙部属的感情。“小说的情形就和诗歌不同，在战争中小说还是比较衰歇了。理由是容易了解的。小说的制作需要有更多的静观，小说的读者也需要有更高的耐性。在战时生活中，这双方都不容易获得。”^①此期的小说创代表性的作品有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老舍的《火葬》、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等。《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是“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一首最壮丽的史诗。在叙事与抒情的辉煌的结合里面，民族战争的苦难和欢乐通过雄大的旋律震荡着读者的心灵……无论在思想内容上或艺术力量上都达到了更真实也更宏大的境地。”^②《火葬》是一部反映沦陷区人民武装斗争的故事。作品以北方方文城城外抗日军队中的副队长和汉奸王举人女儿的爱情为线索，描写了敌人的残暴，汉奸的无耻，抗日将士的勇敢和农民的抗日情绪。作者企图通过小说来“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恰恰是自取灭亡”。作者的愿望是良好的，但在作品中并没有得到深刻的体现。作者分析了作品失败的原因：“它的失败不在于不应当写战争，或处战争并无心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的太少。我的一点感情像浮在水面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溶入到水中去。”^③作者的这种自我批评是真实可信的，虽然作品不怎么成功，但作者力图表现抗战的爱国热情和追求现实的精神是可嘉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④描写了一个掉队的红军小鬼，以他的爱国主义的英雄行为在一个白军连长内心里唤起抗日要求的动人故事。小说反

① 郭沫若：《沫若文集 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5页。

② 胡风：《胡风全集 3 评论2》，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③ 老舍：《我是怎样写火葬的》，《老舍文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230页。

④ 《丁玲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映了中共的团结抗日要求，在读者中产生的巨大影响，表现了红军战士象颗红色的种子，带着党的号召在人们心中燃烧、发光。总的来说，此阶段的小说创作在艺术上还比较粗糙。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革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学的性质与任务，而且对具体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具体的文学批评标准等也作出了阐释，毛的这些论述为革命文学创作提供了理性指导。《讲话》以后，大批文学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有了切身的战争体验，战争文学的创作数量和质量明显提高，涌现了不少感情炽烈，散发着浓郁的战火硝烟，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的作品。如穆青的《雁翎队》、杨朔的《月黑夜》、《麦子黄时》、《大旗》、《七勇士》，西戎的《头一次参加奋勇队》，陆地作的《参加八路来了》，林风的《一个农民出身的士兵》，周立波的《纪念》，马加的《滹沱河流域》，周而复的《地道》、《高原短曲》，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柯蓝的中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赖少其的《绝壁上》、茹志娟的《一个女学生的遭遇》、石言的《子弹》、夏阳的《生长起来》、薛桦的《破击大队》，等等。这些作品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比较生动丰满，较深刻地反映了抗日军民的思想感情。如《月黑夜》中的爱国老人庆爷爷，《参加八路来了》中的开朗坚强的游击小组长“高粱杆”，《洋铁桶的故事》中因性情暴躁说话声音粗重而获绰号叫洋铁桶的民兵队长吴贵等都是个性鲜明的人物。有些作品较真实细致地写出了人物的思想发展和心理过程。如《一个农民出身的士兵》，揭示了农民刘永棠参军后，在革命部队的洪流中渐渐消解了自身的农民意识，树立起革命的信念和理想。人物刻画是细致的，并没有简单化地处理。小说中臻于成熟的作品是孙犁的短篇。孙犁的抗战小说很少正面表现战斗场面和战斗过程，而是着力描绘人物心灵深处隐微的感情波动，他所表现地是冀中地区一个人物、一对夫妇、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在战争中的小故事，让读者“用心灵抚摸，投入到故

12 革命文学新论

事里，感受到一个人的生活的刺激”，并且使读者“看到了全面的生活，受到全面生活的感动”。孙犁很擅长表现人物的时代精神，他努力于刻画战争对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绪造成的影响，表现冀中人民在战火中的崭新精神面貌，有着较强的时代特色。如《芦花荡》^①里的老艄公，《荷花淀》^②里的男女青年，《嘱咐》^③中的水生嫂，《黄敏儿》^④中的黄敏儿等，都栩栩如生，具有浓郁的艺术魅力。作者善于捕捉一些在战争的特定环境下的所谓“儿女情”、“家务事”来反映人物质朴崇高的思想和纯洁透明的心灵。当应征参军离家八年的丈夫绕道来家探望，匆匆离别时，年轻的水生嫂深情地《嘱咐》丈夫：“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你知道，我们，我们，我们这些留在家当媳妇的，最盼望胜利。”《荷花淀》，四个年轻的妇女，探望参加游击队的丈夫，在归途中遇到故人，在千钧一发之际，从水中的荷花底下看到各自的亲人。青年妇女对丈夫的深情和对故乡的热爱完全融洽在一起，使人亲切地感到冀中地区人民那种紧张而愉快的战斗精神。

解放战争时期，在诗歌创作方面最有影响的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这首叙事长诗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刘志丹领导的陕北地区土地革命中，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遭遇和与地主斗争的故事。作品深刻揭示了旧中国广大贫苦农民同地主的尖锐对立，以及这种对立必然导致农民强烈反抗的规律。作品把翻身、恋爱和武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表明劳苦人民的命运与革命武装斗争的关系。诗人以充满情感的笔触表现了鲜明的阶级对立，尖说的阶级斗争，表现了广大农民从自发的反抗走向在共产党领导下，展开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刘白羽的《战火纷飞》、《无敌三勇士》等一组短篇，

① 《孙犁文集·小说》，1981年版，第113—120页。

② 《孙犁文集·小说》，1981年版，第90—98页。

③ 《孙犁文集·小说》，1981年版，第165—175页。

④ 《孙犁文集·小说》，1981年版，第64—70页。